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六期 ——
(二〇〇七年七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7c)

【史料辨析】假供是怎样逼出来的?——读《吴法宪回忆录》的一个疑问	何 蜀
【五洲震荡】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专访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先生	刘晓波
【往事如烟】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	徐 勍
【各抒己见】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顾训中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料辨析】

假供是怎样逼出来的?
——读《吴法宪回忆录》的一个疑问

• 何 蜀 •

读《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有一个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作者没有写出当年中央专案组如何对他进行逼供从而炮制出为林彪定罪的关键性假供的情况?

众所周知, 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接受审查中, 作了假供, 而且有一个关键性的假供, 即交代叶群向他说过: “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怎么办? 往哪里摆?”

这是用来证明林彪有“野心”、想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夺权”的极其重要的、唯一的证据。

然而, 《吴法宪回忆录》宣布, 这样的话并不是叶群对他说的, 而是汪东兴说的。回忆录记载: 庐山会议开幕前夕, “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 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 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 所以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谈起, 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 汪东兴对他讲: ‘这次修改宪法, 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当

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见《吴法宪回忆录》788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汪东兴说的话，怎么后来被强加到叶群头上了呢？吴法宪坦陈：“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788页）

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到底怎样“千方百计地诱导”，施加了怎样的“种种巨大压力”，使得吴法宪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亲历党内多次残酷政治斗争磨练的老革命，都不得不顺从他们而作出如此关键的假供？

可惜，对这样重要的情节，《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他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的9月24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后，一直没有上面的人来过问他。直到两个月后才陆续对他进行了五次提审。他用了专门一节来记叙“五次提审”（885—897页），这五次提审分别是：

1971年11月20日，审问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注：李震此时已经是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即公安部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问9月12日晚上（即“九一三”前夕）的情况（886页）；

1972年2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叶群1971年8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涉及“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888页）；

1972年3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郭玉峰（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林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问256号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还问了9月8日到12日的情况（889—890页）；

1972年4月上旬，审问者李震、郭玉峰，问1971年空军的防空作战计划（891—893页）。

1972年4月中，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庐山会议情况（894页）。

此外，再未见到有中央专案组提审的记载。

而在吴法宪对中央专案组这五次提审的记叙中，看不出来有逼供的情况。甚至给人的印象是提审者的态度好得来比当今“依法治国”时期的公安局还更讲法制，更客气，更“以人为本”。只有在第三次即1972年3月那次提审中，吴法宪才写到因他为自己辩驳而顶撞了杨德中时，“李震勃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这有点像逼供的样子了。但是作者接着写的是：“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889页）这又一点不像是在逼供了。

从五次提审的内容看，最有可能问及那句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话的，应是第五次即1972年4月中那一次。而作者对这次提审的记叙是，先是李震问他身体怎么样，说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找了一所房子，接着要他交代庐山会议情况。“谈着谈着又不自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

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894页）

一个自感蒙冤受屈的人，而且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阶级革命家”，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假供吗？

不可思议。

显然，吴法宪作假供应该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

当年在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及随通知发出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2年7月2日）中，在材料的第三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中有“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其中写着：“（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出版）

这个亲笔交代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

然而，《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关于这次写交代的记载。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回忆录中却有另外的记载：从1971年9月24日被关进北京卫戍区，到中央专案组第一次提审的11月20日之间（吴法宪写亲笔假供的10月21日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没有遭到逼供，而且受到的是“特殊优待”，看守他的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都很好。”他要读《毛泽东选集》，立即就给他送来了，要报纸看，每天就给他送来《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他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也得到了满足。以后又按照他开的单子，从他家里给他取来了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他要自己洗衣服，请他们代买一块肥皂，先记下账，“他们说，不用记账。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于是，“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883—885页）

多么奇怪！既然没有专案组的人来过，也没有谁来问过什么问题，还生活得如此“清闲”，人们不得不问：假供是怎么写出来的？

“清闲”日子中的10月2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迫使吴法宪写出假供的“种种巨大压力”到底是什么？是谁“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

《吴法宪回忆录》刻意回避这个情节，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吴法宪撰写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目的，自然是为自己辩诬。然而，隐瞒中央专案组逼供的真相，不是就把自己摆到尴尬的位置上去了吗？读者看不到逼供，看不到中央专案组动用了怎样

的威逼手段，就无法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作出那样关键性的假供，甚至会认为：这人怎么这样没有出息，随随便便就可以作出性质那样严重的假供！

隐瞒这样的史实真相，不是等于人格上的自诬、自残吗？

~~~~~

## 【五洲震荡】

### 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 ——专访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先生

• 刘晓波 •

问：毕仰高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简单谈谈您是如何了解中国文革的么？

毕：我从年轻时（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阅读了大量关于关于文革的资料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文章、传记，后来作为专业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很早就是中法友谊协会的会员，在改革开放前曾经两次来中国访问，亲身体验和观察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回国后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文革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革的热心研究者。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毕：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中国当作一个理想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毕：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道十分稀少。除了有一些美国记者记录了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一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才算是有了比较好的第一手的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是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但在当时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因为只有这些风毛麟角的消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就十分简单，也就更容易把它想象得完美。

问：为什么单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这样广泛的推崇？

毕：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在经受一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欧洲人需要一种新的道路、新的办法，去解决他们面前的巨大的社会难题，同时也需要一个理想中的榜样。法国历来是一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新建立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毕：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一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

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公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状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之前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中国政府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对待苏联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毕：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欧洲当时已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共处了几十年，而且我们和俄国离得很近，历史上就多有交往，有大量来自苏联的信息。但对新中国，我们只能靠支离破碎的信息去想象。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经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以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愿意相信。1967年1月，有人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文革的来源》，描写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权力斗争，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事实上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所以即使听到了一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还是觉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义，是很好的东西。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毕：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当时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甚至在外交上与苏联决裂，这些更使我们确信他与斯大林不同，也反过来加强了对他的理想化思维。甚至当时法国总统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何时开始转变的？

毕：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做法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一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当时这个消息还是比较确切的，所以我开始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肮脏的事情，政治斗争如此险恶。正因此如此，两年以后，我再次借机来到中国，我要再亲眼看一看中国20年间的变化，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问：你第二次来华证实了你的怀疑么？

毕：这次的经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十分失望。当然，今天看起来丝毫不奇怪。有一天我去工厂里采访，墙上写着“批林批孔”等等的标语，我照了相。晚上回到旅馆，我们的导游来找我，说我照相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会不高兴。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只有厂长书记才会不高兴。他没收走了我所有的胶卷，我在那之前所拍的照片全都没了。那时中国的风气与50年代完全不同，我走在北京的街上问路，中国人都不敢跟我这个洋人说话。我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直到在广州机场上飞机之前，别人都已经走在前面很远，我还被留在关口，被迫打开我的皮箱让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这次访问使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反思。

回到法国后，我为《世界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通过讲述我这次经历，提出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在文章发表时大半被删除了。编辑告诉我，这些内容是不能刊登的。要知道，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传媒界长年累月地批评本国政府，而我却不能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政策。后来我写了一篇发在《Spirit》杂志上谈我到中国的见闻，叫《杯子里的旅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

问：怎么攻击你？

毕：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一边倒，各大报的主编也几乎是这样的，

你都很难相信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世界报》征集文章纪念他的一生，也向我约了稿。我专门写了一篇带有一些批评意见的文章。最终登出来的文章总共有9篇，其中8篇是赞扬毛的，全部登在头版，而我的那篇被埋在报纸中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没有办法，到70年代法国支持毛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对文革和毛的政策有所批评，刚好可以凑出四个人，结果被称做“四人帮”。（笑）

问：为什么当时法国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们，尤其像萨特这样的大师，也会受到这么深的蒙蔽，去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毕：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毛病，总是喜欢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大发议论，而且充满了幻想。早在17、18世纪，他们就把当时在康熙、乾隆等皇帝治下的中国说成是一个太平盛世。20世纪他们对共产党中国也是一样的，萨特别支持毛泽东和文革，波伏娃也写过一本《中国大长征》。他们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总是要在地球上寻找一片极乐世界。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问：法国的主流舆论是何时开始改变看法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毕：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法国。1977、1978年，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1980年我们听说了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事件。这时法国大众才开始了解真相，才明白他们以前对中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切实际，突然发现原来中国是个和苏联差不多的国家。于是全国的舆论有了一次急剧的转变，从之前的一边倒地支持毛和共产党中国，到一边倒地开始批评他们。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带着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太容易接受极端化的想法，往往之前是一派论调，过了不久就完全跳到相反的立场去了。离毛去世不过几年，法国的舆论就完全成了一片批评中国和毛的阵地，到处都是对中国革命的批评，还有很多对毛的负面评价，甚至有很多矫枉过正的说法，说什么毛从小就道德败坏、利欲熏心，而很多共产党建国中真实的艰苦奋斗和牺牲都不提一句，这样极端的观点我从来也都不同意。当时也出现了几本毛的传记，比如英国记者，Philip. Short的，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还有Chang和Halliday合著的，也不错。但总的来讲，70年代后期完全是一次舆论大逆转，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问：最近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大陆一些媒体有不少人引用欧美朋友的话，广泛宣传说现在欧美人仍然十分推崇文革和景仰毛泽东。

毕：据我所知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一些艺术品往往以文革为题材，但那不是出于崇拜，主要是拿革命现实主义开玩笑，至少现在法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支持文革和毛泽东，也许有个别人，但不可能是主流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很少刊登有关的文章，大众对这些也不再关心，甚至法国共产党现在在法国的名声也很不好，大家觉得他们宣扬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总之，今天绝对很少有人再歌颂文革了，也没有什么人再去赞扬和支持毛了，而是更多地把他和斯大林作为比较，把文革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那种理想化的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有不少深入事实的作品，有一个中国人叫徐文力，写过很多关于中国内幕的报道，组织过民主小组，在90年代末被捕了。还有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毛的个人生活，毛被去除了神的光环。我们曾经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革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不等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是被入侵的外敌逼出来的。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弊病，比如像毛在文革中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去告诉民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些本来都是不难想到的。了解的加深使我们的看法完善起来，再也不会把毛这样的领导人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了，我们把文革也作为一个国家惨痛的教训。

（毕仰高，Lucien Bianco，毕业于巴黎高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为法国知识界

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领军人物，今年 74 岁仍坚持研究和写作，2001 年出版《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获得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原载《选择周刊》

~~~~~  
【往事如烟】

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

• 徐 勃 •

在我 11 岁开始说评书的“口舌人生”中，有一段插曲，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有关的。因为这段插曲，我曾自费上北京去告他们和重庆造反派（当时叫“八一五”派）的状。也因为这段插曲，我后来又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

还在“文革”之前的 1962 年，小说《红岩》刚出版的时候，因为我把小说改编为评书，与罗广斌、杨益言二位作家认识了，那时对他们是很尊重的。我在山城曲艺场的首场演出，他们带新华社记者来听，听完后来到后台，对我的改编大加赞赏，说了不少好话，罗广斌说：“江姐上华蓥山这一章，用《暴风海燕》作标题，很好！”还对我把原书的某些细节加以变动，如江姐在朝天门上船改成了在千厮门上船，这样更增加历史的真实感，听众也会更加信服，还有我为增加生活气息而作的一些场面渲染等等，他们都认为很好。总之他们非常满意。新华社记者还给我们照了合影。

后来到了“文革”初期，庆祝“十六条”游行时，我和他们又在文化局外面的街道上碰到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一阵，罗广斌眉飞色舞地谈起他们在北京受到江青接见的的事，说江青同志对他们的创作很重视，正在组织把《红岩》改编成京剧，改编的剧本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下一步还要把《红岩》拍成彩色电影……

但是，想不到那场“文化大革命”风暴，把我和他们的命运都改变了……

◇ 鼻子不让别人牵

1966 年 5 月，我们重庆市曲艺团还在四川省安岳县为农村抗旱的农民作慰问演出，突然接到指示，紧急调回重庆。原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全团集中学习后，开始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我十分积极，写了曲艺团第一张批判团长孙巧麟的大字报，大字报没有内容，只有一个标题《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巧麟》，我的理由是：我们全身心投入曲艺事业，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而孙巧麟身为团长，却告诉我：明天的事情我都没想。试问，国家尚有个“五年计划”，孙巧麟却这样领导全团，哪里黑哪里歇，这样下去，谁对我们的青春负责？

万万没有料到，后来遭到大字报围攻最多的，不是孙团长，而是我这个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文革”前夕，我是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学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出席过社教工作总团召开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过代表，领过奖状，在曲艺团作演出队长。谁知到了 7、8 月份，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文艺黑线”上的重要人物。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上挂周扬，下连任白戈，再牵到曲艺团就是我，我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三名三高人物”。我从运动初期

党支部划的“一类”，下降成了“三类”，本人荣幸，批判我的大字报数量超过了当权派孙团长。全团就数批我的大字报多，足足有七八十张。连续五十天，天天批判。

自从1961年深秋，曲艺团被重庆市文化局吸收为直属单位，从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一跃而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剧团，旱涝保收，不劳也收。加上每天观众来往不绝的大众游艺园撤销后，我们的演出场地改在山城曲艺场，观众锐减，演出江河日下。一次开会，孙团长说：“除了评书坚持演出，综合场这么多人耍起怎么办？难道就吃《红岩》吗？”他一句话惹恼了众人。但那并非我的意思。“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只眼。”有人振振有词：“我们吃啥子《红岩》？我们靠的是国家发工资，辛辛苦苦挣个全民所有制，图个啥？不就图个盖章拿钱吗？”我却不满足于“盖章拿钱”混日子，总想创新，当然就是“叫花子进药铺——自讨苦吃”了。于是，大字报混战的时候，我就成了众矢之的。

我知道，有的人总觉得艺术名份上我“压过”了他们，该遭他们骂骂。我本着《毛主席语录》本上那一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是真心诚意相信了的。被斗五十天，腿上长了个大疮，我也没叫一声。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外来鸡，到了这群鸡里，天天挨啄，除了没遭啄死，周身的毛是被啄得一根不剩了，成了个“光胴胴”鸡公。

“文革”烈火越烧越猛。自从《人民日报》穆欣的文章点了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的名，任白戈就“靠边站”了。红卫兵起来后，又把他的住宅说成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生活如何如何腐化，还办起了展览。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从我过去与任白戈的接触，我认为任白戈纵有不是，也绝不是腐化之人，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1年，我25岁，立志创新，“舍命说新书”，白天晚上为大众说《王若飞在狱中》，一天只吃七两粮，一场书要一口气讲两个半小时，中午只吃三个死瘪瘪小馒头，拖到下午3点以后学校下课，才能去为学生们专场演出。我是饿饭人出身，本来不怕饿，但是在三十中演出时，却突然休克了。在江北织布厂演出又休克一次。我当时工资三十九元，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说书的收入，每场84块，每天两场168块，全归团里，我只有晚上说书超过11点半，才能报销一角钱的夜餐补贴。后来任白戈知道我工资低，亲自批示给我和另一位青年川剧演员各提了三级工资（我是从三十九块五套成四十五块，然后再加三级）。一个生活腐化的“走资派”，能这样体察下情，关心我们穷演员吗？

这时，社会上的学生已经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得到市委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群众称之为“思想兵”，另一派是造反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文艺界也成立了一个跟“思想兵”一派的文艺革命军。我认为他们是保卫党的，想参加，找到文艺革命军中的熟人，过去多熟的人，要来曲艺团时还找我帮腔：“大师兄多帮助！”现在见了我却避之犹恐不及。显然，我已被“打入另册”了。我这才明白过来：文艺革命军成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算啥？是文艺黑线上的“毒瓜”，人家不愿吸收，我也不用苦求。

有一天，在重庆宾馆外边人行道上，一个学生对周围听众侃侃而谈：“重庆文艺界如果不打倒张德成、徐勍这些反动艺术权威，等于文化革命没搞！”我戴顶草帽，站在人群之中，听到他这样的话，从心里苦笑说：同学哥，这么恭维我，只怕是遭不住啊！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我团有些不能参加文艺革命军的非党、团员，就到社会上去参加串连，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造反就光荣。我不去参加，难道就成了“狗屎堆”？我当然不服气。抱定宗旨：按“十六条”办事，自己成立一个“星火战斗队”，连夜写好《宣言》，贴在山城曲艺场太平门上面墙上，“星火”不归八一五，不属革命军，队长队员都是我，也不牵连其他人，一颗小小的星火。“十六条”号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就背了块鲁迅的语录牌，大摇大摆到各个剧团去“游泳”了！

一天，我们曲艺团的谭柏树叫上我，到大众游艺园文艺俱乐部去，歌舞团的李光亨、李天鑫，群众艺术馆的王以时，话剧团的王戎、刘志成，他们在那里开会，筹备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我听了诸位的高论后，悄然离开。

事后有人问我：“他们讲得如何？”

我回答：“玄学。”

“你不想参加？”

“社会上水太深，我篙竿短，打不透底。”

他们不理解我，我也不明白他们。有人劝我造反，说我出身好，又在“五十天”里受了迫害，是当然的造反派，还鼓励我不要怕被打成“反革命”，我说我就怕当“反革命”，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可以，但是叫我准备当“反革命”，那我就不得干。我的鼻子不拿给别人牵。反正我一个人，哪个组织都不去参加，不听别人指挥。看准了才干，拿不稳不干。错了自己好总结。伙着闹，不扯票，糊里糊涂，挨了刀还不知道是怎么遭弄死的，太划不来！

◇ “一二·四”事件前后

11月初，一天晚上，听说罗广斌、杨益言把市委工作组牛文他们弄到解放碑台子上去“辩论”，实为批斗，解放碑下人山人海，看《红岩》作者亮相造反。我没有挤过去看。但我对罗广斌、杨益言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你们这样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公众人物”，也来凑什么热闹，造什么反？

后来，有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说罗广斌从白公馆出狱的事，一直有人怀疑。市里审查了几次，他自己讲的，和一些特务交待的，大有出入，而他不同时间在各单位作报告时讲的，内容也有出入。因为市委审查他，他就有怨气，认为受了迫害。趁“文革”之机，就起来造反了。

转眼到了1966年12月4日，纸糊山城，墨泼重庆，上午11时左右，全市人心惶惶，都在传说：大田湾体育场，工人纠察队、思想兵这一派利用星期天开大会，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八一五说他们是假批判，去冲会场，二十来万人发生冲突，打起来了，发生了“惨案”！

下午，我走到观音岩外科医院门前，只见一支杀气腾腾的造反派队伍，人人横眉怒目，高呼“还我战友”、“讨还血债”之类口号。街上行人见之无不惊恐。也有人流露出疑问的目光，我也感到疑惑不解：这是建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吗？工人纠察队、思想兵，这些以党、团员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真的比国民党杨森的兵还凶恶吗？听说主持今天大会的还有全国劳动模范黄荣昌这样的老工人……我心中涌上一连串问号。

我干脆跟在游行队伍旁边，跟着看热闹的人流，边看边走。走到七星岗，一些工人从兴隆街里出来，肩上还扛着卷起的旗帜，看样子是一些从体育场撤出来的基层工厂的“工纠”。八一五的游行队伍发现了，一声吼：“打死那几个老保！”当场把他们抓住，旗帜撕了，人也打得鼻青脸肿，又听得一片嚷：“弄回去！弄回去！关起来再说！”冲上去一群八一五的中学生，听说是六中的，把这几个“老保”抓起就走。

这就是“讨还血债”？

类似这样的事，从七星岗到解放碑，沿途还不止发生一两起。我很不理解。即使是报复，也不应该如此，冤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兴诛连，也要沾亲带故。而像这样平白无故满街抓打普通工人，还要整得个半死，这算什么？

第二天晚上，我团八一五派的战斗队“马前卒”们，一个个慌忙火急往外跑。我问：“你们慌慌张张跑啥子？”

“老保在黑市委操纵下打死了我们战友，现在要转移尸体，毁尸灭迹。司令部通知，要赶快去医院太平间、火葬场，把尸体抢回来！”

我听了觉得真是荒唐。怎么也不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庆市委，会做出他们所说的那种事。

我在曲艺团门口徘徊，从街角临江门方向转弯走来一位朋友龚联建，他是消防器材厂工人，业余文艺骨干，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演员。只见他脸色铁青，说起话来满腹怒气。他告诉我，上午会场上打死人的说法完全是假的，现在是颠倒黑白，打人的成了“受害者”，挨打的反而成了“凶手”，这一切都是文联罗广斌、杨益言他们要打倒市委的一次演习。

龚联建没有参加“工纠”，我也不是八一五，社会上两大派，都没有我们的份。但我们都不愿轻信街上的流言，为了弄清真相，相约马上行动，分头进行调查。我决定去文联，看看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在搞啥子名堂。

过了几天，我一早到了重庆市文联，走进院子，迎面见到杨益言，他笑了笑，说：“你来了？里面坐。我这会有点忙……”

“你忙你的，我是来学‘游泳’的，随便看看。”

“你也造反了？很好！很好！”

几个外地红卫兵，忙着与杨益言到小会议室里面去谈话。我也不跟他多说，各自去拜访老友、文联原《奔腾》双周刊副主编张继楼，还没走到张家门口，就见继楼的好友、平时侃侃而谈声震四座的文联业务组长杨世元，提着扫把，匆匆从礼堂内出来，我像往常一样用他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招呼他：“甘犁同志……”

他不答，直摆手，又示意手中的“武器”。我明白他已成了“神”——牛鬼蛇神。我问继楼，他手一指，不再说话，匆忙“劳动改造”去了。

文联院内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继楼也显得神色紧张，因此我在他家不便久坐，只简单说了我家地址，约他上我家去摆谈。他表示：“一定来。”

当我走出这令人不安的文联时，心想，这往来尽鸿儒之所，怎么一下就成了令人毛骨悚然之地呢？

一回首，才发现大门口两边贴着一幅已被雨水冲烂、褪色的对联：

想当初无辜系狱似青松迎风立
看而今横遭诬陷犹红梅傲霜开
横批是簸盖大的五个字：“革命老前辈”。

这当然是歌颂罗广斌、杨益言的了。我十分反感。你们二人年纪并不很大，怎么就成了“革

命老前辈”？还不说省里、中央，就在重庆也有这么多老红军、老八路，他们该怎样称呼呢？你们那本小说《红岩》要不是一些真正的“革命老前辈”扶持、帮助，能写得出来吗？就连小说的名字，也是任白戈这样的“革命老前辈”画龙点睛拍板定下来的嘛！

过了两天，继楼来到我家，摸出一样东西给我看，那是杨世元打扫卫生时，在文联会议室沙发旁捡到的，是某女士写给造反军头目黄廉的一封信。黄廉在沙发上睡觉时不慎掉出来了。为了打倒市委，罗广斌、杨益言与黄廉等造反派头目在文联经常彻夜开会，特别是在“一二·四”事件前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怪事接连发生了，造反派冲会场，抓“凶手”，抢尸体，从火葬场抢来的尸体中居然还有劳改犯人，他们放在体育场里办展览，当作造反“烈士”祭奠！并在红旗上头吊白花，毛主席像前摆花圈，要求前去参加追悼的人向尸体默哀，人人还必须摘下胸前的毛主席像章……

继楼还告诉我，运动初期，工作组进入文联后，发动大揭发大批判，搞大字报混战，文联的人全都被贴过大字报，罗广斌、杨益言他们也贴过别人的大字报，而他们自己被贴大字报很少，总共大约只有六张，主要是要他们交待和马识途、沙汀的关系，因为马识途、沙汀都已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黑帮”。另外就是对他们《红岩》稿费的使用上有些意见。他们后来就说是受了迫害，要造市委的反（我想，我一人在曲艺团就遭写了七八十张大字报，你们三个人才六张，算个什么？）。他们利用小说《红岩》的影响，南下红卫兵的势力，先批工作组，再批“黑市委”。一时间成了造反派的头面人物。继楼还告诉我，罗广斌已经带一些人上京告市委的状态了，正在北京等待江青接见呢。

◇ 自费上京告造反派的状

我把所了解到的“一二·四”事件前前后后的怪事怪现象，向文化局组织科一位干部作了反映，希望他能向上级反映。我跟他是“文革”前在先代会上认识的，大家都是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谁知他对我的义愤不置可否。这时，重庆的党政领导机关都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龚联建也在社会上搜集到不少揭露“一二·四”事件及“烈士”真相的传单。市里无人管，怎么办？于是我二人买了火车票，自费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罗广斌和造反派的状。

在火车上，龚联建问我中央文革在哪里，我说不晓得，到了北京现去找，嘴是江湖脚是路，总会问得到的。

到了北京，我二人跟着一些串连的学生队伍走，被汽车拉到左家庄接待站，我脸上捂着个大口罩，头上戴顶小皮帽，穿件“皮猴”式的蓝大衣，别人认不出来。我们住下后，不轻易和这些学生娃娃搭腔。龚联建悄悄告诉我，他发现这里住有重庆八一五的人。我说：“今夜暂住，天亮就转移，不能让他们认出我来。”我因为“文革”前到处说评书《红岩》，重庆人大多认识我。

天亮后，我二人起床就走，进城去到处逛，想住个没有重庆人的接待站。难！难在重庆来的人多，跑了几个接待站，几乎都有重庆来的学生或其他人员。最后，我想到了去中国文联大楼，据说那里也是接待站，加上我有熟人。结果，我们去了也没敢住，一是看见原曲艺家协会负责人陶钝在打扫院子，二是我团“马前卒”的谭柏树等先已住在这里了。他们见到我，十分惊奇：“你怎么也来了？”“学习嘛，大家来圣地取经嘛！”

我二人很快就甩脱了他们。所以后来批斗我时，说我到北京行踪诡秘，在搞“特务活动”。

怎么办？长安街上的交警，穿着皮衣都冷得直哈气。天黑了，又下着雪，这景象四川人实在少见。我忽然心生一计：“我们住旅馆怎么样？”

“串连的人旅馆不接。”

“我们不是来串连的。”

“办事？要出差证明，你有吗？”

“嘿嘿，我没有，未必你有？”

“冷得遭不住，你还‘讪谈子’，快点设法，找个屋子住下来再说。”

龚联建人高马大，刀子似的雪风，快把耳朵割掉了一样。直催我快点设法。我们此行，一不是串连，二不是上访，提了一大包材料，就是要交给“关火”的人看，为“一二·四”真正受害的人说句公道话。当时是冒风险的，若是被罗广斌他们的人发现了，“瞎子算”（命）都可能除脱。所以离开重庆之前不能声张，当然开不了介绍信。

“走！我们上派出所，说明来意，我想在所里烤一夜火总可以吧！”

“你想得出来！派出所他管你？”

“敢不管？冻死在北京街头，他吃罪得起？”

我们进了前门派出所，所里的人正围在一起烤火，问情况，我们如实相告，说了罗广斌怎样利用“名气”蒙蔽群众，打着造反旗号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伪造“一二·四”血案欺骗中央……因为他们表示不介入重庆两派矛盾，我们就声明，自己不是哪一派，只是本着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公民的良心，自费来京反映情况，我还掏出我六四年出席四川省政协和列席四川省人代会的代表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坏人。我说，接待站我们不敢住，想住旅馆又无介绍信，反正，旅馆属你们管辖，望介绍一下，好耍不论，我们私人掏钱……

经我这说评书的口舌一番游说，派出所总算被说服，介绍我二人住到了大栅栏一条小巷里的小旅馆。

栖身问题暂时解决了。又怎样上告？到哪里去告？

我又异想天开，告诉龚联建，我们明天上外交部找陈老总。一，他是四川人，应当关心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二，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有权管；三，他听过我说评书：1964年他随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市里通知我去成都金牛坝为他们演出过。再说他三弟陈季让先生是我的朋友。仅此几条，我们就可以去登门求见。

北京严寒，满天风雪。外交部前大街的地上，尽是刷的白石灰标语，街有多宽，字就有多大：“炮轰外交部！火烧陈老总！”

龚联建手提一大包材料，望着地上的标语发呆。我说：“走，他写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两个全副武装的门岗，见我们两个一高一矮的老百姓对直向大门走来，立即上前：

“你们干什么？”

“会人。”

“会谁？”

“陈老总。”

门岗看看我们，瞟一眼地上的大标语，不作答复。我说那不妨碍我们来拜访他。龚联建粗喉大嗓说：“他是我们的老乡，炮轰也要来拜会他！”

门岗退了一步说：“你们会他什么事？”

我说：“关于家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

“那你们上政治部去好了。”

在门岗指引下，我们进入政治部的传达室，一老同志把炉子的火加得很旺，满屋子暖烘烘的。内外温差之大，重庆人很不习惯，我们忙脱衣服。老同志见是门岗带来的，也特别关照，忙着要倒开水，龚联建还在客气喊不倒开水，我却问老同志有无茶喝。说书职业，使我懂得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老同志不明底细，忙为我沏茶，我则请他抽烟，大有一见如故的派头。

我俩摆谈起“文化大革命”的事，听说是会陈老总，老同志实言相告，陈老总不住外交部，他是副总理，住新华门里面，详细地址，他也说不上来。他认为我们应当上中央文革接待站去。我们说不知道地方，他说在月坛。

休息一阵后，我们按老同志指点，乘几路几路车，到什么什么地方转，再上几路车，顺利到了月坛，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接待站外，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说得上是人墙林立，告状的，上访的，造反派押着走资派，红卫兵揪着老干部，大字报，小传单，五颜六色，从大门外到小院里，楼上楼下，凡是可张贴之处，无一漏缝，贴得满满的。我们一看，要登记接待，预约时间，如果按常规排轮子，轮到我們，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和龚联建决定：不登记，不预约，趁进进出出的这股乱劲，直捣中心。我们一层一层楼上，一处一处看，好在每个接待室外都挂有牌子：“上海组”、“华东组”、“华南组”、“东北组”……一眼看见“西南接待组”的牌子，我俩就直进屋里。

这是一间大办公室，有几个办公桌，每桌前都有人。负责接待的都是军人，被接待的人，有的在控诉，有的在低语，还有的正泣不成声……我看见左前方，靠墙角那张接待桌前，只坐有似母女般的两个人。心想，这一桌生意差点，就找他。我在前，龚联建在后，我俩走过去，我靠桌站起，听他们说。

那位军人接待员作好了笔录，又告诉对方：“这情况，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待研究后，过三天你来听结果。”

从谈话中，我猜测是申诉冤案。那妇女还想再说，我立马插话：“你还没明白？这同志已经明确回答了你。你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必须研究后才能作出圆满的答复。三天后你来听结果。清楚了吧？该走了。”

这母女以为我是接待站工作人员，站起来边走边说：“好，好，好！”弄得这位军人莫明其妙。他正想站起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和龚联建已经坐到被接待度的位子上上了。

“你们登记了吗？”

“没有。来不及登记，事关重大，十万火急！同志你看我们这副打头，就能估计我们是干什么的了。此地不是详谈之所，希望换个地方，我们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你看好吗？”

我把说书那套经验拿出来，制造了悬念，又做得很神秘的样子，使这位军人不容多想，马上就让我们进到里面一间很小的屋子。我一边说，龚联建就一边从包包里拿出各种资料交过去。

这位军人粗略看过之后说，罗广斌的名字他熟悉，但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并告诉我们，12月17号，据他所知，罗广斌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发言控诉重庆市委时，总理和江青都是退了场的。看到传单上印的罗广斌发回重庆的电报，介绍那天大会的情况，军人觉得明显与事实真相不符。他问我们的想法，我说想见陈老总反映这些问题。他面露难色，只答应两件：一，给我们两位入场券，是近日在东郊召开的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二，开一张给西南文革的介绍信，让我们回川请西南文革接待。我们对这位同志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深感满意，留下我们的姓名、住址，离开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回到旅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看了东郊的批斗大会后再回成都。

这天，我俩手执入场券，进去站到会场的最后一排。我正面对主席台。当看到罗瑞卿大将被造反派用箩筐装着抬进会场，绑着绷带和夹板的腿在箩筐外翘起老高，抬到主席下，一下把人倒在地上，硬逼将军伤残的腿下跪……我的眼泪包不住了。在场的何止我一人心里难过，龚联建暗暗碰我，示意看不下去了，快走吧！

走出来，我俩好久都没说话。直到上了去成都的七次列车，他才骂了句：“到底格老子是革哪个的命？！”

◇ “提审”沙汀、马识途

坐落在成都北街上的西南文革，乱哄哄一片。到处是糊得满满的大字报专栏，谁在接待？鬼都找不着！我领龚联建来到布后街四川省文联，迎面看见《四川文学》负责人李累在扫地，想招呼又不敢，我和他只好默默相视。

在省文联见到老友邹志成，他是《四川文学》编辑，1963年我在成都参加“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专题座谈会，应邀在曲艺晚会上说评书《夺印》，省长李大章、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等领导听了都说好，李亚群当即指示要《四川文学》在这一期上发表，但我没有文稿，当时就是邹志成根据现场录音帮我整理成文字后发表的。还好，这时他不是“牛鬼”。看样子我们只叙友情不谈观点是可以的。他告诉我，目前省文联已进驻了工农兵业余作者造反团，有写诗的白杨树，还有写小说的火笛等。

通过他的介绍，我知道了省文联的变化，得知老作家沙汀刚从雅安游街批斗回来，记得“文革”前有一次，沙汀到重庆，重庆市文化局安排他听逯旭初的书，那时我还没资格上“果”呢！

我出于慕名，想一睹名家风采，龚联建亦不例外，在省文联工农兵造反团的“战友”陪同下，由省文联保卫干部领路，我俩来到沙汀的住处。我们用的是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所以介绍人说：“沙汀，这两位是中央文革来的同志，他们来看看你，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准要花招！”

沙老的住处，一间房，空荡荡，一张床，无蚊帐，床头牵一根绳，挂了张毛巾，床侧一张条桌，想必是写“交待”的书案了。我与龚联建二人都是大衣加口罩，沙老根本看不出我们的真面目。保卫干部给我们搬来板凳，我们坐下，没问话，只想看看这位四川文坛老人。沙汀很瘦，两手扶着床沿坐着，仍有颤颤巍巍之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龚联建是个工人党员，平时说话大声武气，此刻说话也像没底气似的：“我们是中央文革介绍到四川，还有别的任务。听说你从雅安回来，特别来看看你，想听听你近来反省得如何？”

沙老似有所惊，立即站起来，龚联建忙去扶他：“你坐下说，没关系，坐下！”

我发现沙老那下垂的眼皮，突然上扬，眼神如镁光灯一闪，把我也“摄”在他镜头里了。

保卫干部端来三杯茶，沙老摆手，表示不想喝。我们边喝边听他说，听得我想笑又不敢笑。沙老像演戏一般诉说近况，语音清晰，节奏缓慢，说一句，停一停，真如“秋水闲中味”，话入人耳咀嚼深。

“哎，本来这次下去接受批斗，我事前估计不充分，以为最多一天，所以我洗脸帕都没带。”说着，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从床头绳上取下毛巾，擦了擦手和脸，又挂回原处，手扶床沿坐下又说：“我简直没想到会那样闹热，批判的人才多啊！就是再批一天，哪里批得完？结果连着开了两天，我以为差不多了，想不到雅安的人些晓得了，无论如何都要弄到雅安去，不然，人些不依教……唉，好嘛，我又去雅安嘛。对我来说哪里都是一样：斗倒，斗臭，批倒，批够，其实雅安过去不晓得去过好多回，都没得这回印象深刻，去的时候呢是在解放台，大会批斗，好多人看啰，完了还说要游行，唉，这回我真是开眼界了，雅安的大街小巷，头一回彻彻底底走交了！”

沙老说得轻松，我们听得酸楚。走出省文联大门时，正碰到一群受审查的老作家挤在一屋，我怕他们中有人认出我，急忙忙冲在前头，躲开他们的目光。回到旅馆，我与龚联建心情一样，不明白这场“大革命”怎么会是个这样子。

我们到成都，找不到西南文革反映情况，就想找点罗广斌与“文艺黑线”有关系的材料，来说明他造反“动机不纯”。马识途和他是同乡，马识途属“黑线”无疑，若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物证，说明罗广斌也属“黑线”，那也不虚此行。

我们凭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到了马识途家里。

“虎死不倒威”，马识途虽然从“文革”初就被西南局抛出来打倒，几经批斗，但在我们面前仍不失“领导干部”的风度，叫他家属立即把晾在屋里的湿衣服收了。自己先坐到饭桌上方，又叫爱人沏茶，尽量装出一副处之泰然的架势：“你们二位是中央文革的？需要我谈哪方面的问题？只要知道的，决不含糊。运动嘛，当然是要把一切问题搞清。”

估计龚联建是把他与沙汀比较，觉得马识途态度很傲慢，立马打他的威风，手往桌上一拍，操一口“焦盐味”太重的“四川普通话”：“马识途，你站起来！现在不是你训话，是你应当规规矩矩接受审查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老老实实交待罪行，站起来！”

马识途立即现出尴尬的神情，站又不情愿，不站又怕招来麻烦，似站非站弯腰立在方桌后面，一手撑在桌沿，一手理着胡须，看来这胡须是他在被批斗的日子里才蓄起来的。他自负的目光透过眼镜，不住地打量我们，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搞运动嘛，是应有点火力，老实说，过去我就是长期运动别人的人，你们还年轻！”

“晓得你是文艺黑线重要人物，今天要你交待与罗广斌的关系！”

我这话使他一怔，似大出意外：“咦——罗广斌不是红线吗？江青同志都接见过的嘛。”

“管他是哪样，你交待与他的关系。”

“我同罗广斌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同乡，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过接触。解放后，他在重庆工作，很少有什么交往。只是我有时去重庆出差去过他家，但次数也很少。他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你不用打听。没有问题，不会来找你。”

马识途慢慢坐下，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龚联建突然起身，走到观识途身边，一派“逼王要印”的架势：“你把罗广斌给你的信交出来！”

“最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

“过去写的呢？”

“那些年我们通过信。这一年没来过信。”

“凡是罗广斌写给你的，不管哪一年，统统拿出来给我们看。”

马识途无奈，只好将书桌抽屉打开，把收存有序的一叠信件——是几封我已记不清了——交给我们。我们当场一封封看过，内容多半是有关出书稿件的处理问题。为了说明罗广斌是“文艺黑线”人物，这是“物证”。罗广斌无中生有，我们也就无限上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报还一报！

我们把这些信件装入口袋，扔下满脸困惑的马识途，扬长而去。

今天，应当说句公道话，那次冒犯了马老，但他不咎既往，1974年请龚联建去省里讲故事《号声嘹亮》，马老还对龚联建的表演备加赞扬。

◇ “跳梁小丑”受保护

1967年元月8日，我与龚联建回到重庆。我把材料寄放到我妹妹家中，回到曲艺团。这时我才知道，团里的造反组织“马前卒”内部发生分歧，社会上“老保”组织彻底垮台，八一五派统一山城。但是，在八一五派内部又发生矛盾，打起了内战，重大八一五与工人造反军之间矛盾特别突出，于是，以罗广斌、黄廉和首都三司的南下红卫兵为一方，以重大周家喻、北航红旗、哈军工为一方，各不相让，争吵激烈。重庆市文联是“廉罗”（联络）站的指挥部，罗广斌、杨益言成了大忙人。

看到重庆这个混乱形势，我想那些材料放在妹妹家也不保险，我就赶紧把它们交到了离妹妹家不远的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北京之行已经引起了我团一些人的注意。一个说相声的演员，人年轻，嗓音好，但艺术功底比较差，人却十分自负，认为水平应在我之上，但观众不买账，因此忌妒我。听说我去了北京，就怀疑我干了什么不利于造反派的事，于是造反派组织要开我的“辩论会”，重庆市文联还派了罗广斌他们那个红卫兵战斗小组的杨苏、孙世平来参加。山城曲艺场当时是接待串连学生的接待站，临时作为会场，但一点不像辩论会的样子，大标语从楼上往下挂：

“徐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假造反真保皇的跳梁小丑徐勍！”

我心里好笑，量视你几爷子搞不出什么名堂。但把我老婆孩子们是吓倒了。他们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在北京体育场见过大场面的。莫说小小曲艺场，就是揪我到解放碑台子上去，也只不过那么回事，说书人还怕打花脸？

“辩论会”一开始，就叫我“交待上北京干什么”，从这提问，我就知道他们在黑处，我在亮处，心里一点不虚。干脆，大家“讪谈子”！我把两手放在大衣口袋里，一副说《渡乌江》政委讲话的语调：“同——志——们！”

下面马上吼：“打倒徐勍！”

“手拿出来！这不是你作报告，是你坦白交待问题！”

我把手拿出来，抱在胸前，采取川剧表演的指爪手法，说“我”，就指鼻子：“我（一手指鼻子），这次（两手指左前方）上北京……”

下面有的人忍不住笑，有的笑起来：“不准比！”

我也十分生气的样子：“我是艺人，搞表演的，不比说不出来！”

“手依还放回包包去！”

“那我又喊‘同志们’……”

会场乱了，一片哄笑声，说啥的都有。有人上楼拿稻草，有的又拿高帽子，要把辩论会变成批斗会。我忙喊：“各位，你们拿啥都行，请务必端根高凳子来，我马上站上去。”因为我怕几爷子按拢来，我人又矮，人堆堆里挨了打是“黑打”，别人看不见。我说：“要打可以，明来，我站在高处挨打，看得见哪些人出的手，老子是要以牙还牙的！”

会开不下去了。杨苏、孙世平他们主要是想找我从北京带了什么“钢鞭”回来。于是他两个同我们团的李敏康一路，三人押起我去家里搜，把屋里书架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搞着。我就对他们说，北京带回来的材料在我妹妹家，杨、孙二人不信，李敏康就证明我妹妹是住在七星岗上面，他们就把我押起走。

走到我妹妹住家那个巷口，我说尿胀了，上个厕所再说，要不放心，让李敏康跟着我。杨、孙二人不疑，就站在那里等。

厕所在马路对面邮局隔壁。进了厕所，我抓住李敏康：“你信不过我，北航红旗你信不信得过？”

李敏康木了一阵：“你这是啥意思？”

“如信得过北航，你就跟我一起甩掉杨、孙，三两步就进北航联络站，材料已经交到他们手中，但现在要保密，懂吗？”

李敏康同意了。杨、孙二人被我“安了灵官”（定了位不能动），站在巷子口，何时离开的不得而知。

我带李敏康到了北航红旗联络站，一个戴眼镜的人接待我们，他比一般的学生年纪稍大，他对李敏康说：“罗广斌是个搞阴谋的人，他打着造反的旗号混水摸鱼，可以说，他现在是个危险人物！”他还正告李敏康：“你们应当保护徐劭同志！”

李敏康保证一定保密。回到曲艺团后，宣布将我“隔离反省”，这是采取的保护性措施。我这个“跳梁小丑”，落了个外紧内松的管制。

龚联建就惨了。消防器材厂的造反派组织，认为他力大汉子粗，特选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生铁板作“黑牌”，用铁丝挂在他颈子上批斗，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铁杆保皇派龚联建”。名字还用红笔打了×。

我闻讯后，立即奔赴该厂，见他们正在龚联建身上刷浆糊，背上、裤腿上都贴满了“罪状”。我过去在上清寺红园说了几个月的书，红园就在这个厂门旁边。厂里不少工人是我的老听众。现在虽然成了造反派，但是和我没有利害冲突，见面还显得友好。我找到他们头头，一本正经地说：“北京之行有十分重大的保密性，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多则两月，少则一月，将会真相大白，你们不能这样对待龚联建，否则出了一切不测后果，你们谁也承担不起责任。再说，此行

主要责任在我，要斗就斗我，你们提问题，我来回答吧。”

本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就不多，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走了。只有几个造反小头目，对社会上的事又搞不清楚，见我介入后他们也虚了，马上从龚联建身上取下铁牌，龚联建平时是厂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在文化宫话剧队也是专演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今天受此人格上的侮辱，心里十分气愤，当场质问出面的头头：“你们今天斗我，到底为啥子？我是走资派？是牛鬼？”

“龚师傅，今天是不是……”

“呃，不说清楚，我不依教！”

忽然，有工人来报告，说龚联建的妻子在家里昏倒了。我劝龚联建不要和他们争了，马上回家。同时我也告诉造反头头们：“你们也得跟着去看看，如果出了人命，是因为你们乱批乱斗引起的，你们要负责任。”

于是有两个造反头头陪同一路，到了龚联建家。龚联建家在人民大礼堂侧边，枣子岚垭下面马路边上，是厂里的宿舍。我们到了他家，他妻子罗曼君已苏醒过来了。罗曼君一个青年女教师，哪里能承受这种精神打击！听说厂里揪斗龚联建，就吓晕过去了。当龚联建回到家里，她还是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话。我安慰她：“这是一场误会，厂里造反组织对我们北京之行的真相不明，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已把真实情况给他们说了，你放心，我和龚联建办的这些事，我以人格担保，不是什么坏事，退一万步说，纵然今后有个什么，责任由我承担，不会连累你们。”

罗曼君见厂里有人在场，没有多说什么。只讲了一句：“我们龚联建是个耿直人。”等厂里的人走了以后，她才问龚联建：“你遭打着没有？要是遭他们整成个残废怎么办？”

我打趣说：“好在龚联建身体素质好，要是我这个小把把，单是那块铁牌，只怕颈子都要遭挂断！”

幸而不久，为了夺权，八一五派发生分裂，以罗广斌、黄廉为代表的“联络站”，与重大八一五打起了内战，罗广斌被重大八一五这一抓起来了，消防器材厂的造反派，再也不去追究龚联建北京之行的事了。

◇ 罗广斌的被揪和自杀

造反派的内战，在1967年1月底越打越闹热了。

1967年1月31日晚上，解放碑地区停电。日常灯明火亮的市中心，一下子成了一团漆黑，连解放碑都耸立在黑夜中。街上的人流，黑压压一片，没有人高声说话，尽都悄悄地听着宣传车上的广播，很多人自动跟着缓缓行驶的宣传车，宣传车头上的牌子写着：“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宣传车”，四个高音50瓦的大喇叭，广播起来，地皮都在颤动。广播员是男女二人对说朗诵，一声声震撼人心：

“老罗和老杨，整天工作忙，一个想当书记，一个想当市长……”

人们默默听着这些“南下钦差”们揭露罗广斌、杨益言在造反中所干的勾当。因为停电，看不清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但能感受到人们心中都不平静。

同时，在解放碑一侧的美术公司墙上，贴出了一长溜大字报，字迹清楚，文笔犀利，一些人用手电筒照着大字报醒目的标题：《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

大字报落款是“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罗广斌何许人也？》，落款是文艺“轻雄兵”。尽管是黑夜，站在大字报前打起电筒看的人还真不少。

据说，此时此刻，罗广斌一点也没想到城里已经开始对他点名批判，还在重钢以造反派领袖的身份，给工人作报告。大讲他的北京告状之行、如何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发言、“中央首长接见”之类的话。

几天后，罗广斌被北航红旗为首的红卫兵从文联抓走了。

罗广斌被抓的第二天，以一些业余文艺宣传骨干为主的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团，进驻重庆市文联“夺权”，“工农兵”中的几个朋友，都是以前就认识的，约我和龚联建一起去看热闹，我想，正好去看看罗广斌被抓后文联的情况，就跟着去了。到了文联，发现“工农兵”的人把文联机关一大批干部抓起来罚跪，其中包括杨世元、张继楼，我就去给“工农兵”的人说：这两个人又不是当权派，还受过罗广斌的迫害，怎么把他们也抓来下跪？经我说情，他们就把杨世元和张继楼放了。

那时杨益言已经跑到北京找江青告状去了。“工农兵”去抄了他的家，我也跟着去看了。从他家抄出的录音带，是罗广斌给红卫兵作报告的，搬回来在曲艺团放了两三天，后来我说这些东西不能放在团里，公安局派人来取走了。我也不晓得罗广斌被抓到哪里去关着，我只想到，这回造反跳得这样高，怎么下得了台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逃跑，一条是自杀。不过千万别让他自杀了，不然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不料，2月10日，就传出了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跳楼自杀的消息。

造反派的内战越打越厉害，以后发展成为“全国之冠”的山城大武斗，除了没使用飞机，陆、海大战的一切常规武器都用上了，打死了多少人？毁坏了多少工厂、房屋？这段历史谁来评说？怎么结论？罗广斌是“受害者”，后来还给他个人平了反，但在“一二·四”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战火，后来死于武斗的无辜工人、学生们，谁又为他们平反呢？

◇ 我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

当“二月镇反”，4月平反，抓人放人，满城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我在龚联建处借了根鱼竿，在红崖洞下面，嘉陵江边，看江河日下，等鱼儿上钩。从来无此雅兴，临时冒充渔翁。如此消磨时光，搞了半个月，一条鱼没钓着，人倒晒得黑了。

大约在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从曲艺团回家，路经交电大楼，见有人在散发小册子，标题是《罗广斌是个好同志》。我去拿了本，翻了翻，上面印的是他的“光辉业绩”，无非是说《红岩》一书，是他对人民的贡献，尤其把他跳楼身亡，说成是“黑市委”的谋害。上面还印了杨益言在北京为罗广斌开的控诉会，声讨重庆驻军支持下成立的革联会是“伪革联”，在重庆搞了“资本主义复辟”，“谋害罗广斌”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一大罪状。看来他们不把重庆再翻个底朝天是不会甘休的。

我一生就是个“气棒”，是个一戳就跳的角色，当场就对散发小册子的人说：“杨益言为什么不在重庆正南齐北为罗广斌开追悼会？发生在重庆的事，拿到北京去说，北京人又不了解情况，不是听他一面之词吗？”

对方振振有词：“说明重庆太黑暗了嘛！”

我跟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围听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干脆建议：到解放碑台子上去说，大家都听一下。

解放碑这个地方，仰起鼻子揩鼻涕，都会围上一大堆人看。何况事关重庆的大是大非。人群中认识我的又还多，有的还帮我提劲，告诉对方：他就是说《红岩》评书的徐某人。对方是几个南下来的学生，普通话说得很流畅，并不了解我的口才，自认为与我辩论不在话下。

当大家把我们拥向解放碑台子时，忽然从会仙桥方向过来了一群青年，为首的是个中等个子，留的平头，戴副眼镜，穿件白衬衫，他一来，立即插入我们的辩论：“谁说罗广斌是好同志？”

这小伙子声音宏亮，谈锋犀利，出场就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我本来不认识他，旁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重大八一五的周家渝。那还消说，造反派大头目，从六六年起就天天练辩论，早已操出来了。我这样的说书人也自愧不如多矣！周家渝出场，我就退场。

但我还是退不了场。晚上，群林市场八一五派广播站一个姓杨的电工，以前是我的听众，找我去广播站谈谈“我所知道的罗广斌”，我应邀前往，在广播上大讲“罗广斌不是好同志，是个野心家”。于是，我就出了名，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对方反到底派在友谊商店的广播站，从此天天骂我：“徐勃这个牛鬼蛇神！”

八一五造反，制造“一二·四”惨案的时候，我反对八一五，自费到北京去告他们的状。现在，我又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主要是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我赞成八一五听军队的招呼。党、政、公、检、法都瘫痪了，只有军队还没乱，如果再把驻渝部队搞乱，那重庆的社会秩序、人民生活，不堪设想！

◇ 二上北京办“批罗”展览

这时，得知杨益言一伙在北京大开控诉会，宣传罗广斌之死是黑市委的谋害，宣传重庆在驻军领导下已经搞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为反击杨益言一伙的谣言，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决定组织一批人，去北京办“罗广斌自杀真相”的展览，曲艺团八一五派的“轻骑兵”，派李敏康和我参加这一工作。

盐无我，醋无我，二上北京干什么？自己是“文艺黑线”上的“苦瓜”，一个靠工资养家活口的“三名三高人物”，参加哪派都不要的。人家是“革命小将”，犯错误等于游泳喝两口水。我若是参加造反，对了是他们的功劳，略有风吹草动，我便是垫背的“黑手”。羊肉吃不到，反惹一身骚。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想走也得走。

1967年7月，重庆武斗大规模展开，开始是钢钎战，肉搏拚杀。我在群林广播站楼上亲眼看到过两派在解放碑周围用钢钎厮杀的情景，“骑兵进行曲”的音乐一响，两边的武斗人员端着钢钎，慢慢接近，快逼近对方时，一阵呐喊冲上去，戳一枪就跑，也不管戳到对方没有……

武斗很快就发展到小口径步枪打死了人……形势严峻，大战不可避免，我的处境险恶。回家住都不保险。

我有个听众邹爵华，后来是巴渝五交化公司经理，他当时是反到底派。一天在街上碰见我，悄悄对我说：“你快走，我听说已经有人在打你的主意了，说要剪除你的舌头……”

为避险，7月8号，我终于答应，和李敏康一起买了火车票，二上北京。

从家里去火车站，我都提防着被对方的人抓。我换了件旧劳保服，戴顶破草帽遮住脸，穿小巷，走背街，从大阳沟、大梁子、文华街，下储奇门，沿河边走到菜园坝火车站……

一路上的风险就不说了。到北京后，我们住在矿院，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八一五派的一些大、中学生一起，上街办“叛徒罗广斌”的展览，展览是流动性的，一张张贴好照片和说明文字的纸板，用绳子牵起，在街边挂出来，在北京航空学院、天安门广场旁边、广播局门口，都去展览过。重庆建院的陈大泽，是看守过罗广斌的，他就对观众现身说法，讲解罗广斌跳楼的情况。我就讲有关小说《红岩》的一些情况。总之是让首都群众了解罗广斌不是被谋害死的，是自杀的，戳穿杨益言等人制造的谣言，同时还介绍些罗、杨在“文革”中的表现。

有一次，有清华井冈山的学生来看了，对我们说：“你们敢不敢把展览办到清华去？”我说：“只要你们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敢去。”

但是他也不敢保证，我们也没有去。

到8月份，听说重庆武斗打得很厉害，我们担心家里的情况，再也没心思在北京呆下去了。到了9月，一听说武斗稍有平息，我们就赶紧回到重庆。我回来后，就在团里参加搞大联合，然后又和新华书店的人一起送毛选下乡……

我与罗广斌、杨益言的“交道”，就此划上了句号。

不过，我那个“八一五的广播员”的臭名，不久后却使我在外县遭武斗队绑架，山寨惊魂，险些死于非命，当然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拙著《口舌人生》和《红岩春秋》杂志2003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拙稿《武斗队囚徒历险记》。

~~~~~

## 【各抒己见】

### 周泉纁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 • 顾训中 •

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清华乃至全国“文革”中重要人物之一周泉纁的新作《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至今仍无缘得窥全貌。幸好《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有一详细选载，尚能了知大概。众多学者亦已对此书作出评论，从中能间接了解到周氏的主要观点。此地不揣冒昧，仅就通过这些渠道看到的内容发一感想。

无庸讳言，周泉纁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对“文革”运动的研究，并不断地提出自己富有独创的见识，令人感佩。尤其是时下当局想尽种种办法，欲使十年“文革”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周泉纁的研究以及此书的出版，都有着一分意义。关于此点，相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周书观点

的人们都有共识。

但同样庸庸讳言的是，周泉纓在此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与众多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者对“文革”的观感可谓南辕而北其辙，因而引来众多反对、乃至反感，是十分自然的。周书对“文革”从动机到效果全盘肯定，直至对毛的动机到效果也全盘肯定，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1），已经到了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以致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此说掩盖了无数的血泪，怎么能有脸说出这话来？”（2）话或许说得直了点，却道出了笔者、相信还有许多人的心里话！因为，即便退一万步讲，确如周泉纓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是所谓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理论信仰”，但就像毛自己说过的，“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3）。“文革”中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数以百万计，仅以这一条，毛也应该被钉上历史耻辱柱，“文革”也应该被当作人间惨祸而载入史册！因为，生命不是实验室里的试剂，是不能随意被用来“试错”的。

周泉纓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谬误，仅从能看到的主要观点来解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严重误读了毛泽东。此地仅举一例。

周泉纓在书中说：由于毛泽东的关注，“使我第一次真正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才能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4）

周氏所谓“毛泽东的关注”、所谓“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是指毛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时谈及周泉纓和他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段话，全文如下：“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5）

仅从这段述及周泉纓的话语中，能看出周理解的毛“真正发现”、正面肯定周氏“理论家”价值的意义来吗？显然不能！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

在毛泽东的通篇谈话里，对“五大领袖”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这是因为一段时日以来，这些“领袖”们变得不那么听话了，至少在毛看来是这样，因此需要对他们耳提面命。谈话中，毛严厉批评道：“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6）其实，是毛对他们不高兴了，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按着自己的战略部署走了。但是，这“五大领袖”毕竟又是毛亲手扶起来的，因此，他在谈话中又透着“恨铁不成钢”的浓烈情感，公开表明，“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7）。

毛对“五大领袖”有着如此既爱又恨之双重情感，而对周泉纓及其“四一四思潮”却只有反感。他甚至不怕被“打倒”，也要说出这种反感来。他尤为反感的是“四一四思潮”中关于“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的观点。因为，虽说“四一四思潮”实际反对的只是清华园内蒯大富为首的一派“勇敢分子”“坐江山”，认为他们夺权以后，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

清华乱局之根源，因而“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但是，“马上得江山”的毛却从中读出了“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寓意来，这还了得？！岂不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与“巩固无产阶级江山”的“文革”宗旨背道而驰的么？！所以，毛的结论是：“《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sup>(8)</sup>

正是在这种对周泉纓所在的“四一四派”十分反感的语境中，毛谈及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纓，称他是“一派的理论家”，说是应该放出来，以证明中国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这里，语气中透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而没有丝毫正面肯定的意思，相信任何一位冷静阅读的人都会有此感悟。

假如对毛的谈话风格有着更多的了解，也不致发生周氏的误读。

毛在与人谈话时常常是旁若无人，嘻笑怒骂。此次召见的虽称什么“领袖”，却只是他扶起来的几个学生，因而他更是无所顾忌，恣意挥洒。例如，毛在谈话中数度称聂元梓为“老佛爷”，又称她是“哲学家”；称韩爱晶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称谭厚兰“是女皇”，“真了不起”；甚至“口敕”蒯大富当“清华校长”，对立派“四一四”头头沈如愧当“副校长”<sup>(9)</sup>……假如按周泉纓的思维逻辑，将这些话语统统当真，岂不是闹出天大笑话来！

其实，毛的这种将他反感的人物先套上高帽再予以反讽的做法，这并不是第一次。仅以所谓“理论家”为例：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半叶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在党内党外会议上多次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予以冷嘲热讽，肆意攻击，其中一次曾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sup>(10)</sup>其实，在毛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他们那些人当作什么“理论家”，而只是所谓“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教条主义者”而已。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因其“大跃进”、“人民公社”主张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而遭致党内许多领导人批评后，毛泽东恼羞成怒，发起了新一轮清除党内异见人士的政治运动，将带头提出异议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新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他同样倚其权倾一时的领袖地位而对已成落水态势的彭黄张周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称道：“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sup>(11)</sup>假如被批判者真地以为自己因此是被毛“肯定”了的所谓“头号马列主义者”，岂不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么？

1970年发生在又一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那场因设置国家主席而起的名为批判陈伯达、实则指向其“亲密战友”林彪的新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sup>(12)</sup>谁都能从文中读出毛称陈为“天才理论家”的反讽意味，尽管比起周泉纓来，陈的理论素养确实要厚实得多。

那么，毛心目中的“理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他在《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一文中曾作过详尽的描述：“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

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sup>⑬</sup>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个“理论家”定义是对毛自身的“量身定制”。因为，在当时与“国际派”的角力中，“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定义还真有着谁为正统的决定性意义。无论怎样，这是毛自己对此的肯定性见解。也无论对毛的这番定义作出何种解读，都不会与1960年代的周泉纁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历，当时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周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绝不会是值得毛正面肯定的“理论家”，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当然，仅仅从周泉纁因此而激励自己始终未有放弃理论兴趣而言，或许这种误读还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种误读将周导向了怎样的错误甚至荒谬之处，只要看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荒中的基本观点就会明白了。

顺便说一说，周泉纁的误读似乎并不限于此。他对佛陀的基本要义也发生了严重的误读，这需要佛学大德高僧予以解说了。这里只说一点。周自称是“佛学家”<sup>⑭</sup>，并称他是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大彻大悟”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佛陀是世上最慈悲的人。在他创立的佛学中，对于一切生命形态（有情众生）抱有慈悲胸怀、甚至视作生身父母。这也是他要求每一位佛教徒的基本信念。因而，戒杀是佛教的基本戒律之一，连起心动念都是罪过。既是如此，怎么可能如周所称，是佛祖的学说使他“彻底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破解了文革奥秘”，得出毛泽东发动的造成数以千万生命被残害的“文革”只是一次“试错”的结论呢？假如真的以佛学作标杆，那么只能得出“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场人间惨祸，是毛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严重罪孽！因此，毛绝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世界伟人”，而一定直堕阿鼻地狱，受到因果报应！

在当局严禁谈论“文革”，封杀一切相关言论，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文革”历史有着种种误解，而某些“左派人士”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翻案的今天，假如不对周氏的“文革试错论”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批驳，或许真的会出现后人以此为信的结果，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所以，有识之士们应该行动起来，为让“文革”不致被遗忘而作出自己一份努力。

2007年6月12日

注 释：

(1) 本处及以下转述周泉纁观点均引自《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刊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

(2) 转引自王年一《坚决反对“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

(4)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纁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5) (7) (8) (9) 均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6)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注释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10)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2页。



-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 (13) 《毛泽东选集》全卷本第 页。
- (14)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 (15) 梵语 avicinaraka，译为“阿鼻地狱”，意为“无间地狱”。唐·道世《诸经要集》卷十八谓：“彼处恒受苦受，无喜乐间，故名无间。”阿鼻地狱在地狱中品位最下、受苦最惨而没有间歇。阿鼻地狱的大苦果是由“五逆”、“十恶”等大恶业所感召的。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